

【传承与脉络】

个人、学术与国家的关联

——费孝通“江村调查”^①的学术心态史及其启示

王建民

内容提要:费孝通的系列“江村调查”共计26次,时间跨度66年,从中可以管窥他的学术心态史。这一学术心态史深受绅士阶层、时代变局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影响,体现出个人、学术与国家的互动关联。从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一系列“江村调查”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意义上,费孝通晚年从“社会调查”到“文化自觉”的学术转向有其内在连续性,是对燕京学派“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提升和深化。探析“江村调查”的学术心态史,有助于认识新时期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内涵与使命。

关键词:费孝通;江村调查;《江村经济》;学术心态史;社会学本土化

一、引言:“社会学之惑”的深层意蕴

社会学学生和从业者经常被问及“社会学是什么”或“社会学能做什么”,应答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但往往一言难尽,也不易令问者释疑,这种现象,姑且称之为“社会学之惑”。其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与“家庭”、“组织”、“政府”等词语相比,现代汉语语境下的“社会”一词常常带给人空泛虚幻之感:“社会”似乎无处不在,但难觅其踪;每个人都活在“社会”里,却难识其貌。因此,对关于“社会”之学的解释时常使人如堕云雾,便有情可原了。如果说社会学研究像赖特·米尔斯(2001)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它势必与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密切相关,但“虚幻”的社会学如何与个人的体验相关联呢?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曾言,回答“社会学是什么”或定义社会学有三个路径:一是历史的路径,即力求通过对经典社会学著作的研究,寻求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什么,简而言之,“创始人说了什么”;二是经验的路径,即对现代的社会学著作加以研究,以期发现这门学科最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换句话说,“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些什么”;三是分析的路径,即将某个较大论题加以划分、确定它们的范围,并将它们分别划归不同的学科,实际上是问“理性的指示是什么”(英克尔斯,1981:1-2)。不难

作者简介:王建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学史、互联网与社会等。

基金项目:北京高校“青年英才计划”(YETP0976)和中央财经大学学科推进计划。

① 费孝通从1936年至2002年共访问“江村”26次,本文在宽泛的意义上将其统称为“江村调查”。

看出,英克尔斯更多地是在学科或学科史的意义上界定社会学,究其本质,社会学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对象”或可供认识的“客体”。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这种定义“社会学”的方式仍未能褪去“空泛虚幻”的色彩。

在学科或学科史的意义上界定社会学,往往隐含一个知识论预设,即科学世界与日常生活的二分:理性主义是理解外部世界和获得科学知识的不二门径,而日常生活则奉行另一套逻辑,以习俗、惯例、常识等为根据。在学科史的意义上理解社会学,需秉持理性主义视野,客观且有逻辑地理解之。相较而言,中国传统的学思方式与此迥异,表现为学术与人生或治学与做人的统一,甚至学问本身就是做人的一部分。而“做人”不仅是道德上的律己宽人,还关涉对群己关系、家国命运、人生意义等问题的态度和省思。这种运思方式的背后,实际上是物我圆融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非科学世界与日常生活的二分。在这个意义上,欲理解“社会学是什么”,或许可以借鉴中国传统的学思方式,关心社会学家的研究与其人生和所处时代的关联;同时,理解者也需要将个人体验带入社会学家的研究过程、生命历程乃至心态史之中,“将心比心”地理解“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研究。^①

具体而言,本文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为例^②,分析这一多达26次、时间跨度66年的社会调查所书写的学术心态史,以理解个人、学术与时代的深层关联。这里的“学术”主要是费孝通围绕“江村”开展的一系列实地研究以及相关研究;“心态”是类如费孝通(1994a/2009:244)本人所言的“一套想法、一套观念、一套意识”或“人的行为背后,决定行为的心理和意识状态”。江村调查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不仅留下了中国现代学术名著《江村经济》,而且其后续研究跨越了一个甲子有余的个人生命历程和时代变迁过程,在彰显“史”之意涵的同时也蕴藏了较多的反思借鉴意义。^③

本文试图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以费孝通为个案理解中国现代社会(科)学是如何可能的。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学者个人如何立足于时代变迁理解和表达自身,二是社会学或社会科学如何表达中国问题。当然,我们无意于也不可能就“中国现代社会(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个宏大问题给出某种答案;而主要是以此问题为引导理解费孝通,并以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为例深入理解此问题。我们将围绕“江村调查”所隐含的三条线索进行分析:一是费孝通目睹时局变迁对人生际遇和学术选择的思考;二是对时代问题的根源和化解之道的探索;三是寻找传统士人的“治平”精神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途径。同时,我们将这三条线索置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兼及费孝通不同著作之间以及不同时期的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回应时代变局:从思想争辩到社会研究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学术、心态与时代紧密相连,因而对费孝通“江村调查”之学术心态史的追溯,

^① 这样做的意义不仅在于深入理解研究者的观点,还在于在过往的经典研究与当下的学术实践之间建立关联,以延续学术传统、涵养学人品质。

^② 以费孝通为个案,不意味着夸大个体的社会性,而在于更集中地展现作为“社会历史印记”之载体的个人;在承继学术传统的意义上,以个体学者为案例更能体现出“言传身教”的意义。“江村”即费孝通为“开弦弓村”起的学名,下文统称“江村”。1936年的开弦弓村属于江苏吴江县庙港镇,今属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

^③ 杨清媚(2010)认为,费孝通的研究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必经阶段,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学人内在的、延续的思想观念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历史中表达的。

首先需要从这一研究的起点及其所处时代的社会与思想变迁开始。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遭遇“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力东渐冲击了国人长期持续的宇宙观,开启了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的双重变迁,并在思想界引发了关于古今中西的激烈讨论,尤以张之洞(2011)的“中体西用论”和严复(2006)的批评为代表。^①这种讨论,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与思想界寻求社会与文化出路的智识努力,无论关于中西、体用的观点有何差异,都说明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已无法绕开西方而独自解决。因此,中西文化比较是理解西方和重新认识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和建构现代学术的历程也由此而铺展开来。

关于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的出路存在诸多争论,“复古派”、“折中派”和“全盘西化派”大体涵盖了这一争论的主要立场(陈序经,2004)。复古派回应了中国文明和传统如何维系、人心何以安顿的问题;折中派延续了中西文化体用之争和两种文化何以共处的问题;全盘西化派则较为激进地彰显了彻底的思想变革企图。宽泛地说,任何两种异文化在发生接触碰撞之时,在理论上都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争论,或固守传统,或交汇融合,或舍己从他。但观念上的认识不同于事实上的了解;观念层面的“出路”也不等于现实层面的改变,否则也不会出现“娜拉出走之后”的难题了。在根本上,观念争论的困境在于,它主要集中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层面,而非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的具体状态。所以,其结果或具有思想启发的意义,但也可能沦为空泛的议论,甚至演化成高度抽象的“意见”杂烩之汪洋。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学在中国的早期成长可谓恰逢其时,即把“现代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宏大问题从抽象的观念争论逐渐推向实在层面,以吴文藻为核心人物的“燕京学派”便在记录历史、实地调查、体察国情上迈出了重要一步。1929年吴文藻留学归国,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当时的中国社会学还处在模仿或照搬西洋模式的状态,大学里开设的社会学课程和所用教材缺少关于中国的内容,对认识中国社会实际并无直接助益。针对这种状况,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倡导开展实地研究,具体地把握中国真实的社会情况(吴文藻,2010)。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式是开展实地社区研究^②,由此探索中国社会的特点与变化趋势,进而寻找社会重建与发展的道路。“燕京学派”^③也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中逐渐孕育而成。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燕京学派”在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上的探索具有开创性意义。相比之下,抽象的文化论者和社会学者都满怀认识和变革现实的理想热情,但路径上却有着根本不同:前者重在思想争辩和逻辑推演;后者则诉诸现代社会调查、田野工作等方法,侧重于考察中西文化的碰撞在社会现实层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变动猛烈、新旧交替的时节,认识和研究这种影响,既具有社会调查的意义,也具有记录事实、保存史料的意义(吴文藻,1935/2010b:438)。受此影响,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乡土重建》等作品都鲜明地打上了通过实地调查思考时代变迁的印记,或者说,燕京学派学以致用的学术氛围孕

① 对于“中体西用论”,严复(2006:157)指出:“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② “社区研究”受到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尤其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旧译“派克”)的影响。帕克1932年9月至12月任燕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对费孝通影响颇深(参见费孝通,1994a/2009;2000/2009;阿古什,2006:24-28)。

③ 所谓“燕京学派”,指的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吴文藻及其弟子为中坚组成的研究群体,间或涉及几位与吴文藻有相同实地调查旨趣的同事(杨清媚,2015)。燕京学派的成员主要有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李安宅、许烺光等,以及吴门弟子所培养的学生,如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等。

育了费孝通早期的学术风格。^①

不过,在费孝通那里,社区研究不是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简单移植,也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本土运用,而是在根本上体现了对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如何像传统的绅士阶层那样发挥“治平”作用的思考(参见杨清媚,2010)。在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中,这种思考和探索发轫于《江村经济》,而后在《云南三村》、《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等论著中体现出来,如对“礼治秩序”、“教化权力”、“无讼”、“双轨政治”、“基层行政的僵化”等问题的讨论,始终没有离开这一话题。出身于绅士阶层并目睹了这一阶层在变革时代如何适应与转变的努力,是费孝通这一思考的最初来源。

三、“家国情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在学术与人生之关系的意义上,有了学术训练和科学方法,未必有研究的动力和热情,后者往往在学术生涯开始之前就产生了,或者说,学术热情在学术之外。因此,若追溯一个学者的学术心态史,需要探寻其生命史的早期阶段。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在江苏吴江县城的一个绅士家庭,其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当地有名望的读书人,当时费孝通的老家同里镇绅士阶层还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费孝通,2003)。费孝通(2002)曾说:“我的外祖父家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体现了一个旧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从儒学的基础转到接受西方的思想,并让自己的后代接受西式的教育。”“士绅阶层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离开了士绅阶层就不容易理解中国的社会。我从小有机会接触这个阶层的人,所以对他们比较熟悉,并且在我的一生经历中看到了这一个旧中国士绅阶层最后走过的路程。”(费孝通,2003/2009:467-468)

费孝通所见的绅士^②阶层在变革时代的努力,对他的早年经历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父亲费璞安留学日本,后在家乡办学,还参与争民主、搞议会等活动,他搜求地方志的习惯对费孝通影响颇深。母亲杨纫兰是女界先进,放脚、束发、写文章、办蒙养院,费孝通晚年回忆称母亲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费孝通、方李莉,2002)。其他人物有教学、办报、两任吴江县长并官至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秘书长的舅舅杨天骥;有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且人格高尚、急公好义的振华女校高小班老师沈骊英;有一心从事小学教育、充满爱心并对他的人格成长产生较大影响的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参见张冠生,2012:2-22)。

必须提及的是对费孝通具有终生影响的姐姐费达生。费达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了缫丝和蚕丝业技术。1923年回国后致力于家乡和中国蚕丝业的改革与振兴,这一年她不到20岁。^③对于姐姐的工作,费孝通后来说:“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面前,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她自律之严在我同胞骨肉中是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比……做人应当这样做。抛开为人处世之道不提,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

^① 193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经就社会学究竟应该“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应该“学术为实用”发生过一次激烈讨论,当时的费孝通坚持“学以致用”的方向(费孝通,1995/2009:183)。此外,费孝通曾言(2005:22),在燕京大学时认真阅读了顾颉刚的《古史辨》,顾氏用民俗资料印证历史的研究对他影响较大,他1933年的毕业论文《迎亲婚俗之研究》便受其影响。当然,在学术史的意义,注重经验和实用的传统可以追溯得更远,如梁启超(2011:1)在1923年的演讲中指出,近300年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② 在费孝通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区分“士绅”与“绅士”的不同内涵,除引用的文字外,本文一律用“绅士”。

^③ 关于费达生推动社会变革的讨论,参见金一虹、杨笛,2017。

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①(参见邱泽奇,2004:15)费达生所从事的事业,深深地影响了费孝通对绅士阶层在变革时代之作用的理解,尤其是解决农民饥饿、增加农民财富的事业。虽然这一阶层逐渐消逝,但其积极入世、变革现实的“治平”精神,仍然在费孝通身上或隐或显地闪现。换言之,作为整体的绅士阶层可能逐渐消逝,但这个阶层的精神气质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

1928年秋,费孝通从东吴大学附属一中毕业,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就读。促使他选择学医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二是他已经形成的益人益世的志向(张冠生,2012:32)。1930年秋,费孝通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专业为社会学,“后来我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体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于是我改学社会学。学一门学科总得有个目的。我是想通过学社会学来认识社会,然后改革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费孝通,1993/2009:264)。费孝通(2007)晚年曾忆及当时的心态:

当时对于青年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可能……那个时候的青年人的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能当“亡国奴”……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的问题。这个问题从1930年代开始已经很清楚了……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向往。这一切的思想活动都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

总体来看,费孝通少年时代经历了“五四”运动和国家衰败的状况,深受绅士阶层的影响,秉持着一种积极入世的“家国情怀”。在费孝通的学术实践中,这种家国情怀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考察绅士阶层在历史与现实中所处的地位;二是其本人秉持学以致用学术精神,试图像传统的绅士阶层那样发挥变革现实的作用。由此来看,费孝通所言的“无心插柳”的首次“江村调查”在偶然^②中便包含一定的必然性,实际上延续了传统士人的“治平”理想,将个人的人生志向、研究活动与时代变迁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③

四、从“社会”出发回应现代性:江村调查及其继续

基于前文,如果把1936年的首次“江村调查”和随后出版的《江村经济》放到晚清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中看,不难发现,费孝通这一早期研究,处在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回应“从早期的思想争辩转向实地研究”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也是中国社会学兴起和参与现代学术奠基的过程。

(一)“江村调查”:社会结构变迁与时代“真问题”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通过翔实的田野资料,描写了开弦弓村家庭、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职业分化、农业、土地占有、养殖与贩卖、贸易与借贷等诸多方面。费孝通剖析了乡土社会农工混合的经济特质,

^① 综观费孝通的学术历程,这里所说的“追赶”主要是指为了实现“志在富民”的理想而“行行重行行”。

^② 费孝通1935年在清华大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根据导师史禄国的建议,推迟一年出国,先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该年冬,费孝通王同惠夫妇在瑶山迷路失事,妻亡夫伤。费孝通回老家养伤,姐姐费达生邀请他到开弦弓村休养。受开弦弓村缫丝工业的触动,费孝通遂开始了1936年的江村调查。

^③ 杨清媚(2010)认为,费孝通在心史的延续与客观历史的断裂之间书写。

指出西方机器大工业冲击下中国乡土工业的崩溃激化了潜藏的土地问题,导致租佃关系紧张与社会矛盾叠加。“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孝通的结论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费孝通,2001b:236)在《乡土重建》中费孝通再次指出,必须重整乡土工业,建立新的合作性社会组织,发展乡土工业本土化,最终实现社会重组。

费孝通之“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于,他看到了“人民的饥饿问题”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联。从城乡结构上看,乡村是农工并重的生产基地,百姓依靠土地耕种和手工业收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随着人口累积和农村劳动力过剩,一些拥有土地的相对富庶的百姓出租土地,进入设施较为完备的城市,以征收地租和利息等方式获得所需的粮食和劳役,逐渐形成了较大的市镇。另一种社区形式是都会,都会一方面把大批洋货运进来,一方面又利用机器制造日用品,于是挤垮了乡土工业,夺走了乡下百姓的手工业收入。并且,都会和乡村通过大市镇进行经济交易,导致市镇中的地主进一步压榨乡下百姓,结果与日俱增的地租、利息使农人贫困至极,于是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变得紧张。对于乡村来说市镇是一种负担。

在“江村调查”中,费孝通对农民的日常生活做出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分析,将他的发现、结论和对策,都奠定在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可以说,费孝通抓住了时代的“真问题”——农民的饥饿和生存问题;这个问题关涉家庭维持、社会稳定甚至现代国家建构。而关于“重建乡村工业”和“社会重组”的主张,实际上是依循中国社会结构和变迁的独特路径,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道路(参见甘阳,1994)。^①在学术实践和社会重建的双重意义上,可以将1936年的“江村调查”看作费孝通将中国现代学术建构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关联起来的最初努力,既是对严复等先贤所奠定的中国社会学“上识国体,下察国情”^②的基本精神的继承,也是“燕京学派”之“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具体实践。

(二)“整体地”看社会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不直接描写农民的经济活动,而用了很多笔墨描写亲属关系、亲属称谓、小媳妇制度、财产继承等方面。整体地看,如果脱离了这些背景因素,江村农民的经济生活是无法理解的,例如“小媳妇制度”^③正是物质生活困顿下一些农民的不得已做法,只不过是这种“不得已”已变成一种广为接受的习俗了。另一方面,相对于农民的经济活动而言,亲属关系、地方习俗、婚姻制度等是具有久远传统根基的“民情”,脱离这些民情,经济活动便难以理解。要言之,费孝通是在中国历史与传统的大背景下理解江村农民的经济生活的,尽管这未必是有意为之。这也说明,费孝通所实践的社会学中国化是基于对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的整体性理解的“中国化”。^④

^① 张静(2007)以《经村经济》为例,指出燕京学派作为社会学群体的角色,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

^② “中国社会学在发育和发展过程中,确立了上识国体、下察国情的基本精神,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形成了客观认识,更是在每个阶段里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提出了总体构想。”(应星、周飞舟、渠敬东,2011:11)

^③ 又称“童养媳”,男孩的父母在女孩很小的时候领养她,并一直抚养她到结婚。如果女孩是在丈夫家中养大的,那么婚姻的一切复杂程序如做媒、行聘、接亲船、轿子等都不再需要了(费孝通,2001b:62)。

^④ 本文认为,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实地研究、记录历史上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那么其晚年的“文化自觉”主张可以看作是在思想文化层面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倡导与推进。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些文章里,费孝通(1933/2009;1934/2009)即已表达了他的社会整体观。这种整体观不仅强调社区内部各要素的依存关系,也关注不同地区的比较及其对于认识社会整体的意义。在方法论上,费孝通指出“微型社会学”的限度,为了认识众多结构不同的农村,需要通过对不同类型社区的研究逐渐取得总体的认识(费孝通,2001a:327;2006:7)。因此,在江村调查之后,对“云南三村”(禄村、易村、玉村)的研究便顺理成章了。通过对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的比较研究,费孝通提出一个一般性论断,即农村中土地占有的集中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是“受现代机器工业的影响,传统乡村工业衰落,农民收入减少”的结果。

总而言之,无论是整体地看问题,还是社区类型比较研究,都没有离开“全面认识农村社会文化”并进一步“认识中国”和“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的初衷。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试图通过现代社会科学方法,从整体上认识中国社会和探寻社会建设的道路,这体现了他早年“科学救国”的抱负,以及变革时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热情,当然,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困境埋下了伏笔。^①

(三)连接历史与现实

在费孝通个人学术史的意义上,他的后续研究或多或少都是对“江村调查”的继续。在《皇权与绅权》(1948)一书中,费孝通与吴晗等学者讨论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以及绅士阶层在其中的位置。这个讨论在《乡土重建》(1948)、《中国绅士》(1953)等著作中得到了延续。从费孝通早期著作的内在线索来看,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探讨是一系列实地社区研究的继续,或者说,是从历史的角度深入剖析当前问题的根源。

费孝通对中国绅士的讨论包含两个重要关怀:一是考察绅士阶层在历史与现实中所处的地位。费孝通(2001c:46)认为,一个完善的政治制度必须保证有上下平行的“双轨”,因为在任何政治体系下,人民的意见都不可能完全忽视,如果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至少是他们的容忍,政治制度不可能长期维持,由皇权通过地方官僚机构到基层社会是自上而下的一轨,相反是自下而上的一轨,而在皇权圣谕的下达与民意上传中,绅士扮演着中介人的角色,这就是著名的“双轨政治论”。二是指出社会研究如何对现代国家建构提供知识依据。例如,近代保甲制度的推行破坏了地方自治的防线,旧的机构失去了合法地位,新的机构并不能有效推行地方公务,导致基层行政没有效率(费孝通,2012b)。

这两个关怀也是费孝通学术心态的写照。正如王铭铭(2007)所言,《禄村农田》表面上与《江村经济》形成对照,实则二者前后融通,都在论述费先生眼中作为进步力量的士大夫的历史创造力。中国真正的公共生活来自何处,只有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才找得到答案——士绅作为粘合皇权与个体人民的化合剂,是“中国社会”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关键要素。就这点看,无论是《江村经济》还是《禄村农田》,都是《皇权与绅权》铺陈的知识分子社会学的“注脚”。因此,或许可以说,从《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再到《皇权与绅权》,费孝通早年所受的绅士阶层的熏陶以及姐姐费达生积极投身乡村蚕丝事业的精神,一直贯穿在他的研究之中,确切说,一直活跃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在根本上,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及其后续研究,既继承了传统士人的“格物”与“治平”精神,又通过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超越了传统学术在应对现代性变迁上的困境。

^① 参见本文第五节的讨论。

五、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学术心态简史

费孝通一生共访问“江村”26次^①,从1936年的“一访”到2002年的“二十六访”,从26岁到92岁,时间跨度66年,长达一个甲子有余。毫无疑问,“江村”与费孝通的整个学术生涯紧密相连,其个人的学术史与生命史牢固地交织在一起。根据时间和关注的主题,我们尝试将费孝通26次访问江村的过程分为如下4个阶段(见表1)。

表1 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四个阶段^②

阶段	时间跨度	主要研究议题
第一阶段:“一访”至“四访”	1936-1982	发现问题,重建乡村工业
第二阶段:“五访”至“十一访”	1982-1986	小城镇研究
第三阶段:“十二访”至“十五访”	1987-1991	乡镇工业深化与区域发展
第四阶段:“十六访”至“二十六访”	1992-2002	学术总结与反思

第一阶段:“一访”至“四访”(1936-1982年,发现问题,重建乡村工业)

1936年“瑶山失事”后的费孝通返乡休息,接受了姐姐费达生的建议去开弦弓村参观访问,被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所吸引,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1936年7月至8月)的调查。在《江村经济》的“著者前言”中,费孝通(2001:1)说:“这本书的写成可说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联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调查结束后,费孝通携调查资料赴英伦留学,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1938年春论文答辩通过,由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江村经济》^③即根据调查资料写成。

1957年春,费孝通第二次来到江村,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做了详细调查,发现粮食产量提高了,但工副业被忽视了;农民虽有土地可耕种,手里却没有钱花;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小城镇和各种集市也萎缩了。于是,费孝通写了《重访江村》和《重访江村(其二)》两篇文章。^④1981年10月费孝通三访江村,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农村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农、副、工相结合的现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在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纪念章时,费孝通便以“三访江村”为题,就江村自1936年以来的变化发表了演讲。1982年元旦后,载誉而归的费孝通四访江村,与村民分享喜悦,并向乡干部了解生产生活情况。^⑤

第二阶段:“五访”至“十一访”(1982-1986年,小城镇研究)

① 关于费孝通26次访问江村的情况,参考了沈春荣,2013;冯月根,2015。

② 费孝通访问江村,有一年两访,或多年一访,因此各阶段之间在时间上有重叠或间隔。

③ 原名 *Peasant Life in China*, 1939年由英国 Routledge 书局出版。

④ 1957年2月24日,费孝通(1957a/2009)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就知识分子问题发表意见,表达了他对如何在新时期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期待,从中可以管窥费孝通对新时期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发展的迫切心态。在《新观察》杂志发表的《重访江村》连载报告尚未结束,费孝通即被错划为“右派”。

⑤ 我们在本文第三节讨论了费孝通青年时代“弃医从文”的志向和“科学救国”的理想。众所周知,这一志向和理想在20世纪50年代遭遇挫折。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其影响的不仅是社会学从业者的学术生涯,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看,也波及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历程。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之后费孝通积极推动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不仅是恢复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之林中的席位,也是其青年时代播下的“科学救国”种子的再度萌发。费孝通(1980/2009:432)将社会学恢复重建视为“为了前人的遗志,为了我几十年来的信念,为了子孙的好处”。因此,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在根本上是接续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任务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之后费孝通持续不已的江村调查,其实仍然是在探索和回答社会科学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的问题。

费孝通曾言：“小城镇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是江村研究的继续。”(2001:3)“我们的小城镇研究是从农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1984/2009:349)1982年10月费孝通第五次访问江村，对当时乡镇工业的兴起联想到小城镇的复苏，以此做了一次探索性的考察。1983年5月，费孝通六访江村，围绕小城镇兴衰变化情况进行了考察，同年9月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做了《小城镇大问题》的报告，对小城镇衰落和复苏的原因做了重要的论证(参见费孝通，1983/2009)。1983年10月，费孝通七访江村并到附近村镇调查，指出小城镇复兴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工业经济的繁荣。

1984年10月费孝通针对乡镇工业和城乡联结型的区域经济发展作为调查重点，第八次访问江村，肯定了乡镇企业发展对小城镇复兴的作用(参见费孝通，1984/2009)。1985年7月，为了撰写《江村五十周年》费孝通九访江村，邀请土改时的村干部和现任的村干部分别举行座谈，详细地询问了农民生活和经济负担情况。1985年10月，为纪念访问江村50周年做准备，费孝通十访江村。1986年5月，费孝通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根干枝、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巴乃特共访江村。

第三阶段：“十二访”至“十五访”(1987-1991年，乡镇工业深化与区域发展)

1987年5月，费孝通第十二次来到江村，先后访问了无锡、常熟、吴江、吴县，了解这一地区工农关系的新发展和新问题，研究乡镇工业的第二步发展问题。1987年9月，费孝通关心苏南小城镇建设中的共性问题，再到江村深入调查。1990年4月初，费孝通开始了包括南京、杭州、上海的长江三角洲之行，并于4月14日至15日第十四次来到江村访问调查，就家乡的经济结构和外贸优势，提出了长江三角洲的开发和外贸格局的新构思和观点(费孝通，1990a/2009)。1991年4月费孝通再次来到江村，充分肯定了吴江经济发展的路子和所取得的成果(参见费孝通，1991/2009)。

第四阶段：“十六访”至“二十六访”(1992-2002年，学术总结与反思)

1993年10月，费孝通第十六次访问江村，和“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代表实地考察了“江村”风貌。1994年10月，费孝通第十七次访问江村，了解家乡的新变化和配合拍摄专题片《行行重行行》。1995年5月，费孝通又一次回到故乡，听取了吴江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关于进一步繁荣吴江经济的战略和正在制订的全市实现基本现代化发展规划的情况。1996年4月，费孝通第十九次访问江村，在农户徐林宝家详细询问了家庭收入情况，听取了吴江市委关于加大太湖开发力度，充分利用水资源和实施太湖综合治理的战略措施。

1996年9月19日，费孝通来到江村共庆《江村经济》调查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1997年4月8日，费孝通走访了两家农户，了解生产生活情况。1998年4月2日，费孝通在江村走访了村民的家庭工厂，走访了费达生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缫丝女工，还了解了农户除耕作收入之外的致富门路。1999年4月13日，费孝通参观了“费孝通江村访问60周年的图片展览”，并参观了村民的家庭工业。2000年4月1日，费孝通在江村听取了村级领导的汇报，走访了村民家庭。2000年9月4日，费孝通在江村听取了镇领导的工作汇报，参观了镇办缫丝厂，并走访了部分村民。2002年9月29日，费孝通在江村走访了部分村民，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江村。

前后共计26次的江村调查与费孝通的学术历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20世纪30年代“无心插柳”的江村调查，新中国成立后对乡村工业的重申，到19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及其深化，1990年代关于发展长江三角洲的建议，以及进入新世纪后对城乡发展的持续关注，体现出在一个甲子多的时代变迁和个人命运沉浮中，费孝通先生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脚踏实地的研究精神以及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总体来看，多达

26次、时间跨度66年的“江村调查”，彰显了费孝通之连接个人、学术与国家的学术心态史，这一学术心态史，既有连续性又发生了变化（参见表2）。

表2 费孝通“江村调查”各阶段的学术心态简况^①

阶段	时间跨度	主要学术心态
第一阶段：“一访”至“四访”	1936-1982	认识社会，学术为国
第二阶段：“五访”至“十一访”	1982-1986	顺应时代，建设学科
第三阶段：“十二访”至“十五访”	1987-1991	行而复行，志在富民
第四阶段：“十六访”至“二十六访”	1992-2002	学术反思，文化自觉

不过，费孝通的学术心态史并不是一个学术、心态与时代变迁并行无碍的过程。本文认为，只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上理解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才能挖掘其更深层的意义。从1936年的首次江村调查到生命的终结，从《江村经济》到《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2003），费孝通始终思考的是如何像传统的士人那样在变革时代的社会结构中发挥“治平”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无法靠疏解传统经典的义理来实现，而需深入真实的社会生活之中。但费孝通的困境在于，作为整体的绅士阶层已不复存在——尽管士人精神可能或多或少地隐存，而且无论政治体制、生产方式还是人们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现代中国”都与“传统中国”有着重要不同，那么，专门化的方法何以能应对总体性变迁？舶来的学问又如何能切中本土民情人心？这是费孝通的困境，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建构的困境。

虽然费孝通（1994b/2009：423）曾说，他不在意他的学术属于“哪一门、哪一科”，“称之为社会学也好，称之为人类学也好”，主要看“它是否抵用，能不能富民为断”，但实际上，他也未能真正地摆脱专业化的限制。毕竟，费孝通的学术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专业化的结果，而这种专业化并不是中国社会自然内生的，因而便难以应对中国全方位和总体性的变迁问题。不过，与其说这是费孝通本人的限制，毋宁说是中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孙立平，2005）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古今中西的矛盾交织；总体性变迁与专业化科学的复杂纠缠。基于对这种困境的认识，我们便可以尝试理解费孝通晚年的“学术转向”。

六、“社会调查”与“文化自觉”的内在关联

在第二十一一次访问江村的同一年，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概念，并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概括文化自觉的历程（费孝通，1997a/2009）。^②此外，费孝通（1992/2009；2003；2003/2009）晚年多次反思自己一生的学术历程，指出从“生态研究”到“心态研究”的学术方向。^③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2003）认为：“最理想的，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从方法论层次上进行深入探索，探索如何基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视角，开展对人的精神

^① 关于各阶段学术心态的划分和概括依据，除了本文提及的内容外，参见费孝通《为社会学说几句话》（1957b/2009）、《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决定于它的任务》（1957c/2009）、《再为社会学说几句话》（1979/2009）、《社会学的历史使命》（1987a/2009）等文章。

^② 关于“文化自觉”的其他文章，参见费孝通，1997b/2009；1998/2009；2002/2009；2004/2009。

^③ 从第十六访到第二十六访，费孝通深入农户家了解民生民情，尤其是访问了和他年龄相当的江村村民，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费孝通对“心态研究”的重视和初步实践。

世界研究。”“心”、“意会”、“将心比心”、“讲不清楚的我”等都可以大做文章。这需要深入古代文明中去,以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在费孝通看来,这本身就是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就是“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的一种重要实践。

费孝通对文化自觉、心态研究等的思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现实根基。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去世之前,多次对跨文化交流、国际冲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等问题进行思考,这再次体现出其将个人的思想、学术与时代变迁紧密结合的特点。当然,费孝通并未改变他数十年一以贯之的“学以致用”和“志在富民”的志趣,只是增加了在东西方文明的层面对人类社会的新现实进行理解,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当下之关联的思考,这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里尤为明显(费孝通,2002/2009)。

将费孝通晚年的学术转向置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历程中可以发现,文化自觉的思想与心态研究的主张,都是以中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为依托,将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看作承继和发掘中华文明的知识与实践活动,这一倾向早在《中国绅士》中已现端倪。从“社会调查”到“文化自觉”所凸显的社会学人文向度,实际是强调社会学之“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费孝通,2003),而不是对“科学”向度的摒弃或代替。^①循此思路可以认为,20世纪30年代“燕京学派”明确提出和实践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在费孝通晚年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和深化,即将社会学看作中华文明脉络下和中西文明交汇中的学问,使“社会学中国化”具有了包括科学与人文、生态研究与心态研究、社会调查与文化自觉等在内的核心内涵。

因此,与其说“文化自觉”和“心态研究”是费孝通晚年另辟蹊径的努力,不如说这是对其多达26次、时间跨度66年的“江村调查”之学术心态史的续写。正是基于“江村调查”等经验积累和对社会变迁与国情体验的把握——或者说,矢志于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认识和理解^②,以及致力于探索现代学术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的精神,才会有从“社会调查”到“文化自觉”的转向,否则“文化自觉”便成了“无源之水”,失去了其现实根基和社会意义。因此,在我看来,费孝通晚年的学术转向,更多的是其学术研究的“延伸”而不是“跳跃”、“连续”或者“断裂”。实际上,从“社会调查”到“文化自觉”的转向,本身就体现出费孝通个人学术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为理解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建构提供了线索。

费孝通晚年“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回应前文提到的“专门化的方法何以应对总体性变迁”和“舶来的学问如何切中本土民情人心”这两个问题。这对于日益专门化、碎片化,甚至时常陷入方法论之争的中国社会学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警示意义。由此出发,对于尚处于建构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而言,需要走出零散碎片的研究方式^③,秉持“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传统志趣,既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文明想象,又能够洞悉社会结构和情理人心,这不仅是建构现代中国学术的基础,是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要前提。因此,探析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学术心态史,有助于认识新时期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乃至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内涵与使命。

① 苏力(2007)较早地探讨了费孝通对儒家文化的发展,“我认为他在现代中国社会真正延续和拓展了儒家思想,初步实现了儒学由人生哲学、世俗宗教向社会思想、理论和方法的转变,拓展了人类学术思考的空间”。

② 1987年费孝通在和美国人类学者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的对谈中说:“事实上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唯一目标就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这个目的从1930年开始就明确了。”(费孝通,1987b/2009:10)

③ 例如,渠敬东主张“重返经典社会科学”(2013),“返回历史,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2015)。

七、结 语

每一项学术研究或学术活动都是研究者一系列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在现象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这些社会行动构筑了个人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另一方面,任何学术研究或学术活动本身只是研究者所赋予之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对个人学术史和心态史的梳理便尤为必要,以理解研究之外更丰富的意义构成。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阅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或其他论著,回溯“江村调查”简史的时候,就像在阅读他的人生传记和学术传记;而当我们试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之时,似乎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言谈举止和所想所思。或许,这是因为我们在阅读和理解他的同时,也在“将心比心”地面对、理解和反思我们自己。

本文试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上理解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学术心态史。一系列江村调查实际上是在探索传统的士人精神如何与现代社会科学相融合以及现代学术何以可为的问题,其所展现的积极入世的家国情怀、从实求知的研究精神、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以及自我突破的学术勇气,为社会研究者的学术实践做出了示范。以此为参照,化解本文开篇所言的“社会学之惑”,其实是面对三个问题:什么是“好”的问题?即研究者的学术关切是不是回应了时代或社会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好”的研究?即有没有通过适当的方式(理论和方法)探索和回答了问题;什么是“好”的学者?这里的“好”不仅指个人的研究能力和理论洞见,更关涉个人的性情与修为,或者说,学者是否将学术研究与个人生命、时代变迁甚至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以至于为人们做出了比什么是“好学者”更根本的什么是“好人”的示范。

在延续学术传统的意义上,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学术心态史的重要启示是:第一,脚踏实地,体察民情,投身于丰富的日常生活,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根据,揭示时代变迁的“真问题”并探讨化解之道,需以此为前提;第二,中国现代学术实践仍需回到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既为了深入理解当下,也为了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第三,社会学研究在探究社会结构的同时需深入情理人心,甚至只有洞悉情理人心才能认识社会结构;第四,文化自觉是社会调查的基础,也为社会调查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才能建构中国现代学术;第五,把握个人性情、学术取向与国家和时代的契合,会使一个人是“做学问的人”,也使一种学问是“做人的学问”,为学为人其道一也。就这五个方面而言,也许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费孝通都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本文初稿曾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纪念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八十周年学术纪念会”(2016年10月22日-23日,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上宣读,感谢刘豪兴教授、王建民教授、钱宁教授的评论;也感谢论文评审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 阿古什,2006,《费孝通传》,董天民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陈序经,2004,《中国文化的出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1933/2009,《我们在农村建设中的经验》,《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34/2009,《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57a/2009,《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全集》(第八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57b/2009,《为社会学说几句话》,《费孝通全集》(第八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57c/2009,《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决定于它的任务》,《费孝通全集》(第八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79/2009,《再为社会学说几句话》,《费孝通全集》(第八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80/2009,《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答〈中国青年报〉问》,《费孝通全集》(第八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83/2009,《小城镇 再探索》,《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84/2009,《小城镇 新开拓》,《费孝通全集》(第十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87a/2009,《社会学的历史使命》,《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87b/2009,《经历·见解·反思》,《文化的生与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 1990/2009,《长江三角洲之行》,《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91/2009,《吴江行》,《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92/2009,《孔林片思》,《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93/2009,《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94a/2009,《略谈中国的社会学》,《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94b/2009,《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97a/2009,《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97b/2009,《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1998/2009,《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2000/2009,《补课札记》,《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2001a,《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
- , 2001b,《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
- , 2001c,《再论双轨政治》,《费孝通人生漫笔》,北京:同心出版社。
- , 2002/2009,《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2003,《谈探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 2003/2009,《暮年漫谈》,《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2004/2009,《“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2006,《云南三村·序》,《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07,《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 2012a,《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乡土重建》,长沙:岳麓书社。
- , 2012b,《基层行政的僵化》,《乡土重建》,长沙:岳麓书社。
- 费孝通、方李莉, 2002,《早年生活与文化熏陶——费孝通访谈录》,《民族艺术》第3期。
- 冯月根, 2015,《费孝通江村调查纪事》,《乡村规划建设》第3期。
- 甘阳, 1994,《〈江村经济〉再认识》,《读书》第10期。
- 金一虹、杨笛, 2017,《现代性的另类追寻——费达生20—40年代的社会改革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梁启超, 201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米尔斯, 2001,《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邱泽奇, 2004,《费孝通与江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渠敬东, 2013,《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尝试》,《社会》第1-2期。
- , 2015,《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社会》第1期。
- 沈春荣, 2013,《费孝通教授江村访问记事》,吴江通网站, <http://www.wujiangtong.com/webpages/DetailNews.aspx?id=9664>, 2013年5月31日。
- 苏力, 2007,《费孝通、儒家文化与文化自觉》,《开放时代》第4期。
- 孙立平, 2005,《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铭铭, 2007,《从江村到禄村:青年费孝通的“心史”》,《书城》第1期。

- 吴文藻,1935/2010,《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与功用》,《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2010,《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严复,2006,《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杨清媚,2010,《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史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5,《“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社会》第4期。
英克尔斯,1981,《社会学是什么?》,陈观胜、李培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应星、周飞舟、渠敬东,2011,《中国社会学文选》(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冠生,2012,《费孝通》(上),北京:群言出版社。
张静,2017,《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社会学研究》第1期。
张之洞,2011,《劝学篇》,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The Connection of Individual, Academics and the Nation:
Fei Xiao-tong's Academic-Mental History of Jiang-cun Investigation**
WANG Jian-min

Abstract: Fei Xiao-tong's Jiang-cun research covered 26 times in a span of 66 years, from which we can see his academic-mental history. This academic-mental history was shaped by the gentleman stratification, social change and academic community, which reflected the connection of individual, academics and th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state, Jiang-cun research was actually exploring how Chinese modern social science was possible and what it could do. In the later Fei Xiao-tong, there was scholastic turn from social investigation to cultural consciousnes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construction, there is inner consistency in this turn and this turn is promotion and deepening of Yan-jing School's standpoint of sociological indigenization. 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and mission of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and even Chinese social science in the new period.

Keywords: Fei Xiao-tong; Jiang-cun Investigation; Peasant Life in China; Academic-mental History;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责任编辑:王水雄)